



[美] 查尔斯·库普钱 著
洪漫 王栋栋 译

NO ONE'S WORLD

没有主宰者的世界

即将到来的全球大转折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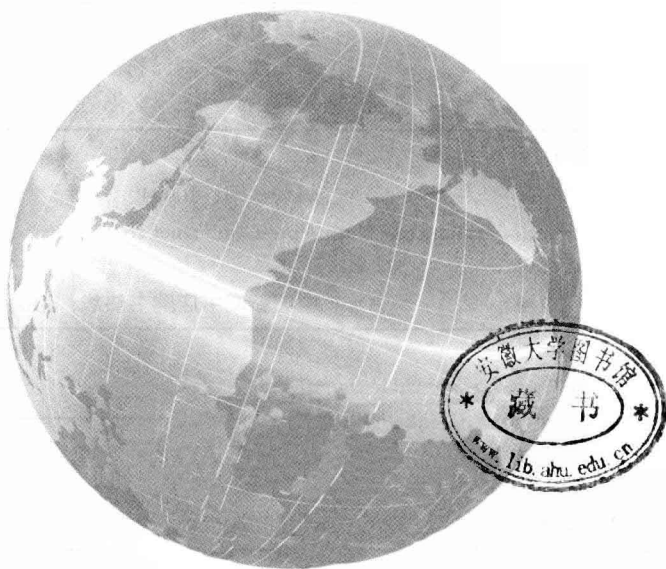
美] 查尔斯·库普钱 著
洪漫 王栋栋 译

NO ONE'S WORLD

没有主宰者的世界

即将到来的全球大转折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主宰者的世界：即将到来的全球大转折 / (美)库普钱；洪漫、王栋栋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2

书名原文：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ISBN 978-7-5166-0246-1

I. ①没… II. ①库… ②洪… ③王…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02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2-4740

Copyright © 2012 by Charles A. Kupch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s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没有主宰者的世界：即将到来的全球大转折

作者：[美]查尔斯·库普钱

译者：洪漫、王栋栋

出版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编辑：张敬

责任校对：刘保利

责任印制：廖成华

装帧设计：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0

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排：图鸦文化

印刷：河北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2年12月第一版

印次：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66-0246-1

定价：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转折 / 1

多元现代性 / 3

论点 / 7

计划 / 13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 / 15

历史的轨迹 / 17

中世纪欧洲发生变化的政治图景 / 21

宗教改革运动 / 30

迈向宗教宽容和政治多元化 / 38

第三章 上一次转折 / 55

西方优胜于其他任何地方 / 57

奥斯曼帝国 / 58

中国、印度和日本 / 70

西方走向全球 / 76

第四章 下一次转折 / 87

其他地方的崛起 / 89

严酷而不争的事实 / 89

第五章 西方模式的替代 / 101

强力政治 / 108

神权主义者 / 129

铁腕人物 / 142

民粹主义者 / 148

有进取性的民主 / 157

全球歧见 / 160

第六章 复兴西方 / 163

西方的凝聚力 / 165

问题重重的西方 / 170

重建西方的偿付能力 / 187

第七章 管理没有主宰者的世界 / 205

未来世界的原则 / 211

第一章 转折

多元现代性

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奥古斯塔号”军舰和“威尔士亲王号”军舰上举行了一连串秘密会晤。这两艘军舰都停泊在安全的纽芬兰港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之际，这两位领导人聚在一起，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世界蓝图进行规划。他们精心炮制的《大西洋宪章》设想了以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美国此时尚未参战，但是此次会晤标志着美国从此开始承担为西方世界掌舵导航的职责。日本于当年晚些时候袭击珍珠港后，美国率领大西洋民主国家在二战中走向胜利。接下来，美国稳固了自由主义秩序，重创了共产主义集团，以胜利的姿态步出冷战。

到了20世纪末，历史将走向终结已成为时髦的论点。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民主和资本主义迅速传播；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二战结束后构建的国际秩序看上去大有涵盖全球之势。虽然中国、俄罗斯、古巴以及中东和非洲的多数国家最为顽固，但预计它们很快也会抵挡不住西方模式的无限魅力。随着新千年拉开帷幕，西方不仅操控了局势，而且看上去已经战胜了许多对手。

时间快速来到2009年12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上百名世界领导人聚集一堂，就限制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制订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议开始后的第11天抵达，而到了此刻会议几乎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晚，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四国代表举行闭门磋商，以加强新兴大国间的团结。在此次会议眼

看就要结束的时候，奥巴马直闯会场。助手们手忙脚乱地为这位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安排了座椅。此次即兴举行的会议最终实现了突破。但是，协议远远未有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希望的具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新兴大国掌控大局，美国的欧洲伙伴甚至未能出场。就这一局势逆转，《华盛顿时报》宣称：“美国世纪结束了。”

诸多迹象表明，21世纪并非标志着西方最终取得胜利，而是标志着全球态势迈向转折点而不是终点。哥本哈根峰会只是这些迹象之一。随着新大国的崛起，西方不仅失去了自己在物质上的首要地位，还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非西方国家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西方国家的三倍，拥有的盈余令其能够承担美国忽高忽低的债务。全球衰退让俄罗斯经济遭到重创，但克里姆林宫却能够牢牢控制着这个国家，并且正在遵循强硬的外交政策。石油蕴藏量丰富的海湾酋长国虽然受到迅速席卷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骚乱的震荡，但它们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治国方式。此外，如果参与型政府在中东蔓延，那么这种政权或许比之前的政府更难对付。就连崛起中的民主大国，如印度和巴西等，都几乎不能算是西方阵营的铁杆支持者。相反，它们定期在地缘政治、贸易、环境等诸多问题上与美欧背道而驰，它们宁可与新兴国家并肩战斗。利益重于价值观。

与此同时，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步履蹒跚。问题远远超过在西方设计师和主脑——美国——诞生和蔓延的大衰退。美国总统小布什踉踉跄跄地走过自己的第二任期，其支持率跌至谷底。奥巴马在上任时，承诺要恢复两党合作和国家团结，但民主党和共

和党却一直无法达成共识。难怪到了2010年，美国公众对国会的信任度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并非唯一面临公众对民主制不满的国家。许多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近来都受到选民分裂、政府疲弱的困扰。

日渐浮出水面的图景是，权力日益分散，政治日渐多样化，而不是所有国家都对西方模式趋之若鹜。事实上，世界正处于全球大转折。在1500-1800年之间，全球权力中心从亚洲和地中海地区转向欧洲，至19世纪末转到了北美。西方然后利用其权力和意志来维系一个全球化世界，并且从那时以来就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西方的崛起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来说都已成为过去，历史正朝前迈进。东亚已被粉饰为最有可能披上领袖斗篷的候选者。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是否会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或者任何模式能够主导今后的世界。21世纪不会是美国的，不会是中国，不会是亚洲的，不会是谁人的；它不属于任何一方。即将出现的国际体系将拥有多个权力中心以及多元现代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不会有引力中心或者全球守卫者。全球秩序——如果它出现——将混合着形形色色的政治风气，民主和国际秩序的概念相互竞争。

如果未能预见到这一全球大转折，因此未能调整西方的宏图伟略，那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后果很严重。有可能的失误已在形成之中。问题并非美欧战略家们没有认识到权力正日益分散。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新大国正在崛起，而西方的卓越地位将无可避免地日落西山。事实上，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已带头把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指挥部八国集团改造成二十国集团，把主要的大国

吸纳进来，而西方民主国家在该集团中实际上占少数地位。

然而，大多数战略家却曲解了全球权力分散构成的根本性挑战的本质。主流观点认为，西方大国应该利用自己卓越地位的暮光，把其他国家围拢进它们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中。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①认为，西方应该“把这一秩序之根尽可能深地扎下去，从而确保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仍然可以成为21世纪的主导秩序”。趁现在还有能力，西方必须完成将其价值观和机构向世界其他地方延伸的进程。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②虽然已经认识到今后会出现“后美国世界”，但他也落入了同样的观点陷阱。“如果应对得当，权力转移……对美国有好处，”扎卡里亚写道，“世界正走上美国的道路。各国变得越来越开放，对市场越来越友好，越来越民主。”

如此阐释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或许让美国人及其民主盟友安心，但实际上这是异想天开。中国这艘大船不会在西方的港湾靠岸，顺从地停泊在分配给它的泊位。新兴大国不会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的条例，而是会理所当然地从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出发，谋求调整流行的秩序。它们从一开始就在这么做，接下来的时代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当务之急并不是把新兴大国引领进西方的港口，而是应该建立一个新秩序，其基本

①自由主义理论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著有《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变》。

②印度裔美国人，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师从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和斯坦利·霍夫曼，并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主编，从2000年10月起担任《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2005年4月开始，扎卡里亚在美国公共电视台主持谈话节目“国际交流”。

条款必须由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通过协商制订。西方在谋求建立一个把其他国家包括进来的新的国际秩序时，将必须做到施予和接受同样多。

世界不仅正驶向多极化，还正迈向多元现代化——在政治多样化的环境中，西方模式仅是许多互相冲突的国内国际秩序的一个版本。不仅是新的发展模式会继续与自由民主制角力，而且新兴民主大国也会定期与西方分道扬镳。或许，对西方和正在崛起中的其他地方而言，决定性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大转折中控制好方向盘，按照设计好的路线和平地抵达下一个世界。否则，在多个权力中心及其代表的不同的秩序概念角逐首位的时候，混乱无序的状态就会悄然出现。

论点

本书并非首部预言西方超群地位下降的著作。然而，它是首部透过“长镜头”凝视下一个世界的著作。诚然，本书是依据当前事件对当今世界走向何方进行了描述，但是它更多地依赖更深刻的历史力量和模式。它对西方崛起的根基以及其他地方崛起的影响进行了全景式描述，此外，以前的研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权力平衡发生的改变上面，而本书则主要关注这种力量的转变对世界如何运转意味着什么。它深入研究了其他地方的崛起将如何影响治国方针、国家管理、战争与和平以及贸易的理念和条例等。最后，本书是首部认为下一个世界不会由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主导的著作。有些人预见到一个将热

烈欢迎西方价值观和秩序概念的全球共同体，而另一些人预见到亚洲世纪的出现。本书则认为，下一个世界将没有引力中心，它不属于任何一方。

如要弄明白当前全球权力过渡的本质和影响，就需要先了解上一次全球转折——西方的崛起。因此，本书一开始研究了西方在1500-1800年上升为全球主导地位的历史。西方沿循的是一条独一无二但又或然的路径。而有些悖论意味的是，走上这条道路是西方政权变得疲弱的缘故。在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秩序混乱不堪，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向君主制、贵族制和教会发起挑战。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接着充当了“新教改革”的开路先锋，倡导宗教宽容，为政教最终分离奠定了基础。

代议制政府接踵而至，现代国家的成本越来越大，再加上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君主们不得不与臣民分享权力，以便获得民众的资源 and 技能。新兴中产阶级也为工业革命打下了经济 and 知识基础，而工业革命加强了市场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公共教育、大规模征兵和其他社会发展催生了世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成了民主化的孪生姐妹，提供了能够通过共识而不是高压手段把社会联结起来的结缔组织。

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率先在西欧出现，然后通过移民扩散到北美。这些移民在新世界定居下来，寻求经济机会和宗教自由。其后，欧洲和北美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西方政治秩序。这一秩序拥有三个主要特点：自由民主、工业资本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因此，西方不仅成为地缘政治区——把北大西洋联结起

来的大陆——的代表，还成为与众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的代表。

这些特质让西方拥有了非凡的特点，让它能够在争夺卓越地位时冲到其他竞争者的前面。奥斯曼帝国、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等级秩序更为僵化和森严，妨碍了自身出现推动欧洲和北美崛起的那种变革，从而使西方到了19世纪时成为全球的引力中心。此外，大西洋民主国家在同一时期冉冉上升，再加上它们拥有类似的国内秩序，因此出现了西方风格的全球事务管理方式。西方谋求将其国内民众接受的价值观和机制推向全球；出于利益和原则等原因，欧洲和北美竭尽全力输出民主、世俗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西方的基本理念在全球传播，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种单一的秩序概念能够在世界上多数区域生根发芽。这一秩序长时期且扩张式地运行着。不可否认，它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西方模式会盛久不衰。

然而，坚信西方确立的全球秩序盛久不衰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这一秩序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物质主导地位的产物，而不是其理念具有普遍吸引力。尤其是自苏联解体以来，西式秩序一直是一枝独秀。发展中国家被时不时迸发的高压推着走，它们除了遵从西方规则之外几乎别无选择。但是，既然西方的物质优势地位风光不再，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就非常成问题。其他地区在崛起时还会继续遵守西方的规则当然听起来貌似可信，但是它们只有在自己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国内价值观和机制与西方国家趋同后才有可能这么做。换言之，要维持西方秩序，就需要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时，沿着西方的路线建立本土国家共同体。

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不会复制西方与众不同特质的。这些特质包括自由民主、工业资本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等。诚然，资本主义已经展示了其普遍吸引力，但是大多数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等——并没有在因循西方的发展路径。这些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经济根基，发展了自己的内部秩序和意识形态倾向。因此，新兴大国将想要修订而不是巩固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对于政治合法性、主权的本质、国际贸易条例以及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新兴大国有着迥异的观点。随着物质力量的膨胀，它们会想方设法以对其利益和意识形态倾向有好处的方式来重新确立国际秩序。新兴大国因循的发展路径是西方路径的替代品，而不是在前往全球趋同的路上临时绕个道。

如果说西方的崛起是其内在且无可避免的优势所带来的成果，那么世界上其他地区将很有可能朝西方模式移动，但这么做也只是因为西方模式是实现繁荣和安全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西方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条件所造就的，不是因其模式具有优势而恒久不变。如今的现代化是在一个迥异的全球背景下进行的。在西方崛起时期，中产阶级是变革的主要代言人。而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是现状的捍卫者，而不是政治改革的驱动力。在近代，国际体系既行动迟缓又缺少变化；动能不得不从下面产生，权力更分散、更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比等级森严的帝国更能够提供这种动能。而今，国际体系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渗透；从许多方面来说，更集权化的国家比更多元化的国家更能够自如地应对全球化。虽然在创新方面，国家领导的经济有自己的弱势，但是近来

的经济危机已明确表明，西方的金融管理并非完美无缺。在如今的多层面全球体系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各有优缺点。出于这一原因，21世纪将拥有多种类型的现代化，而不是沿着西方路线的政治大趋同。

在全球多样化面前，自由民主将继续传播或许是很有可能的。过去两个世纪里，自由民主的传播速度虽然缓慢，但当然存在。全世界的人们都渴望自治和尊严——从最近的世界动荡中可见一斑。但是鉴于两个原因，即使民主的足迹继续扩大，西方仍然无法想当然地认为，即将到来的全球转折会与西方秩序的普及化不谋而合。

首先，时间问题。全球引力中心的转移正在加速；在15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在今后30年，国际排序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相形之下，民主的全球传播速度将大大变缓。超过100个国家仍然由不民主的政权统治，为代议制政府打造社会和机制支柱需要时日。值得牢记的一点是，英国在17世纪末成为君主立宪制，但是过了两百年时间才发展成自由民主制。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成为君主立宪制，但是它花了80年时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才使民主制扎下根来。诚然，比起一两个世纪前，如今从集权制度向代议制政府过渡的速度要快得多；民主现在拥有重要的滩头阵地。但是，几乎可以百分百地确定，世界早在变成民主化前，就会变成多极化。正如阿泽尔·盖特（Azar Gat）^①所说：“即使资本主义非民主大国最终实现民主，该进程仍然

①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著有《文明世界的战争》。

需要几十年或者几代人的时间。”

其次，即使民主得以传播，出现的新政权不一定只是因为西方的条例是民主化的就会遵守它们。换个说法，民主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事实上，民主化催生的政权很有可能坚决反对遵从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举例来说，在中东，越民主越有可能意味着政治上越伊斯兰化，而新出现的阿拉伯政权由于代表民意，因此比上届政府更不愿意与西方合作。在大多数举行过这样或那样民主选举的国家——伊朗、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领土、黎巴嫩和伊拉克，伊斯兰教加强了对政坛的控制。其他地方的民主化也同样给地缘政治狂热火上浇油；更民主的中国很有可能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此外，即使新兴大国分享西方的价值观，它们仍会在地位和声望的问题上与西方南辕北辙；其他新兴地区憎恨长期以来受到西方霸权的奴役，希望在重要的全球事务的治理方面拥有话语权。因此，崛起国在追求国家利益时也会奋起对抗西方。当美国在19世纪末崛起为大国时，美英两国共享民主价值观和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然而，美国把英国赶出了自己的区域；美国希望在西半球享有无可匹敌的卓越地位。当然，随着资源的增加和野心的膨胀，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都可能会渴望获得同样的地区霸权，从而有可能与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发生对抗。关于各国只要拥有民主政府就会与西方步调一致的假设，与世界上很快就全部是民主国家的命题一样，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随着全球继续发生转变，西方和崛起的其他地区随时都会在原则、地位和地缘政治利益方面一决高下。对西方和其他地